

Y-42/55

前 言

文史資料工作，是我國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起着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並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和革命史提供書刊、檔案所沒有的活資料，在為“四化”服務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本刊本着“存真求實”和“多說並存”的精神，不強求統一。對所有資料均作了反復核對。為編寫現代史和革命史提供真實的資料。

本輯所收諸篇，大部分為回憶錄，有的是根據作者口述整理的，有的是集體撰寫。作者多為在撫松工作的老前輩。他們都是當事人，或親身經歷，堪稱歷史見證人。這些資料，從史料觀點來看，是很有價值的。

本輯編著過程中得到有關單位和熱心史料工作同志們的熱情幫助，終於和讀者見面了。在此，一並致謝。

由於我們的水平有限和經驗不足，錯誤在所難免，尚請同志們指正。

熱烈歡迎各方面同志向本刊投稿。

編者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我在撫松工作的一段回忆·····	馮若泉	(1)
忆中共辽宁省委撫松工作团·····	陈 宇	(6)
撫松县第一支人民武装保安团·····	唐林根	(8)
我在撫松县万良区工作的回忆·····	孙錫亮	(13)
把解放区人民的心送上去·····	张克勤	(18)
姚福通路传·····	李元东	(26)
匪首于福·····	宋永春整理	(29)

我在撫松工作的一段回忆

一九四五年“九、三”日本投降后，我随何长工同志率领的延安抗大总校派的一批同志来东北。原计划到沈阳，由于国民党政军政人员乘轮船、坐火车抢先到了沈阳。我们靠两条腿走路，晚了一步，只好绕过沈阳来到了朝阳镇。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被中共辽宁省通化分省委派到蒙江县（今靖宇县）任政委，具体落实建立南满根据地的指示：发动群众，站稳脚跟，蓄积力量，解放全中国。

一九四六年八月我调到抚松县工作。当时抚松的形势很紧张。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南满十几个县，唯有抚松、蒙江、长白、临江四个县在我们手中。抚松是南满根据地的咽喉，境内到处闹匪患，区、村政权又不巩固，有的村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尚未真正发动起来，民众得不到生活的保障。为了加强抚松县的领导力量，省委决定派通化分省公署副专员刘崑林到抚松兼任县长；派通化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金才到抚松兼任县大队队长，（后改为保安团）；派通化分省教育处副处长郭绍义兼任抚松中学校长。

一九四六年，县委还没有公开，县委成员在我到抚松之前有李政、李南洲、姚福通等人，我到抚松之后由我和刘崑林、李天、郭绍义、唐林根等人主持工作。十一月份，省委派陈宇带领省委工作团，到抚松帮助县委开展土改工作。陈宇任县委付书记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七年二月，县委增设宣传部和民运部。方述才任宣传部长，郭绍义任民运工作部

长。

各区也从工作团中选出一些干部，充实和加强了区委的力量，一区书记解剑峰，二区书记李枫，三区书记江椿，四区书记李纯六，五区书记蒋仁武，六区书记钟山，七区书记范杰。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借以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在一九四六年七、八月份，召开了抚松县各界人民斗争恶霸地主张子珩大会。会场设在抚松实验小学的操场上。同时展出了张子珩幻想变天，筹集、窝藏的十几支步枪、几万发子弹和一些手榴弹等罪证。我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全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各区干部、群众代表以及城厢区群众一万多人。会上，首先由群众代表揭发、控诉张子珩出租千亩田；放高利贷、抢夺城区商会会长职务，勾结日伪警察署长，放捐要税欺压群众，勒索商人，埋藏枪支、弹药，企图反把等罪行。最后，我代表人民政府讲了话。这次大会对全县震动很大，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有些群众高兴得燃放鞭炮，杀猪宰鸡，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歌颂共产党为民除害，为民造福。同时提高与增强了反奸清算队伍的战斗力，培训了战斗骨干。这次斗争大会以后，抚松地区的反奸清算斗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不久在万良区召开了枪斃奸奸袁梦周大会。接着，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迅速展开。运动的整个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土改后，又吸收了中农参加政权管理。

为了保卫革命政权，必须加强武装建设。首先加强了党对县大队的领导。解放初，县大队政委和大队长分别由县委书记和县长兼任。经请示地委，由我兼任第一政委，派李天

任县委副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辽宁军区又派通化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金才兼任县大队大队长，唐林根任副大队长兼参谋长，以后县大队扩编为撫松县保安团，李金才兼团长，李天任政委，唐林根任副团长兼参谋长，我仍兼第一政委。为补充枪支弹药，我又亲自坐爬犁去安图县。历时三天三夜，拉回来八十多支步枪，一挺机枪，装备了县保安团和区中队。

当时撫松很繁华，县虽不大，但对南满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贡献却不小，不仅保证了驻在撫松的楊靖宇支队三团，李红光支队，野战医院、荣校、军用被服厂和省、地部分机关及单位的粮食、战勤需要，而且在“四保临江”、“柳南大捷”，“红五月战役”等解放南满的战斗中，参加支前人力达三万多人次，大车、爬犁等四万多台次，担架三千多副。

为了统一领导撫松境内的党、政、军各方面的力量，一九四七年五月，经过辽东军区批准，成立了撫松县人民武装指挥部。李红光支队长吴靖宇任司令员，撫松县保安团长唐林根任副司令员，我任政委，司令部成立了纠察队，加强了军纪管理。

一九四六年，撫松出现一次“陶弼”事件。陶弼是河北冀东人，老解放区的一名教员。在日本侵略军大扫荡中，被捕入狱，押在沈阳监狱。由于他有文化，伪看守经常用他搞些犯人登记、统计数字等工作，所以同狱犯都叫他“陶秘书”。“九、三”光复后，他与同狱案犯都被苏军营救放出狱，国民党占领沈阳后，他就到梅河口参加了革命，被安排在海龙县公安局做一般工作。

一九四六年初，海龙县监狱羁押了十几个县的国民党部书记等要犯。在国民党纠集几万军队大举向南满根据地进攻

时，海龙县公安局派副局长林平（女）带队，将羁押的国民党要犯转移到蒙江县。这时林平因即将临产，海龙县公安局便由排长胡凯带队回了海龙。所以整个工作都由陶弼与靖宇县公安局联系处理。几天后，国民党打到辉南县样子哨时，靖宇县大队副大队长曹东翰等人密谋策划叛变，並派人与国民党联系，約定五更天鳴枪为号，里应外合，占领蒙江县城。結果由于县大队一名战士的枪走火，打乱了曹东翰的叛乱计划。虽然曹东翰沒敢动，但其他人已按密謀行事。当时我任蒙江县委，我們在李紅光支队的配合下，很快消灭了叛乱分子，抓到了一个叛变的副连长，經审讯弄清了主謀是曹东翰，經县委討論，把为首的五名叛徒押赴楊靖宇墓前枪斃了。在这次平息叛乱中，陶弼表現很好，斗争坚决。后来我調到撫松工作，由于当时形势紧张，上級决定将那十几个县的国民党部書記长等要犯轉送到撫松。陶弼又随同押送这批犯人一起到了撫松。当时，撫松县处于土匪多、汉奸多、案件积压，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我和刘崑林向地委請示征得地委同意后，提任陶弼为撫松县公安局副局长。过了两个月左右，我从临江开完会回到撫松县委，看見我桌上有一封信，是陶弼写的，大意是：田政委，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我管的案子，用的东西，都放在原来的卷柜里，我現在要到外地做一件惊人的事，回来报答你，另外手枪我带走了，还拿点路費……。后来他在临江旅店中将手枪放在他通訊員的身边逃走了。

我們檢查了他管的案卷，都整齐地放在卷柜里，沒收的大烟土和錢多數都在。沒有查出什么問題，于是，我們向地委做了汇报，並下令通緝捉拿逃犯，但始終未能捕获。

他逃跑的主要原因是海龙县公安局长周治理要到撫松采。事先，周給我打電話，由于我去臨江開會，電話轉到縣公安局，陶弼接了電話，周讓陶轉告我，說周幾天後來撫松。陶弼怕周治理到撫松後，暴露他謊報黨員，老干部的底細，所以他留下條提前跑了，這件事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馮若泉（原名田稼丰現任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

口述

東春、斌芬整理

忆中共辽宁省委撫松工作团

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土改工作会议。会议后期，决定組織工作团到撫松。会后，調原在临江以西、八道江一带工作的临西工作团到撫松工作。这个团是由省委和临江地委共同組織领导的。临江地委书记是郭維山、副书记是馬义芝。（短时期撤銷了临江地委。）

十一月三日通化失守，把临西土改工作团人員集中到临江，进行訓練。十一月下旬（或十二月初）工作团来到撫松县。工作团的組織名称是中共辽宁省委撫松工作团，归省委领导。

省委书记白坚、副书记刘汉生。原定工作团长由郭維山、馬义芝担任。后因郭、馬两位同志未来，便由我帶队，我既是工作团团长，又是党的負責人。工作团成员除原临西工作团和省的干部以外，还有从辽宁老二分区在四平、梅河口撤退时撤下来的干部。全团共有百余人。

工作团团委由各片負責人組成。大营地区工作团是辽宁省军区民运工作部許副部长，我帶去的人主要在城内，由谢劍峯負責。万良是江橋，抽水是郭紹义、李純六負責。我经常住在三道庙峯，与我在一起的还有范杰、袁淑兰同志，北崗、东崗也派人去了。

阴历年前，省委决定让我兼任县委副书记和組織部长。工作团的人員与县委干部都是一起工作。任工作团的干部不屬县委，县委也无权調动，但在工作中要一元化领导。

一九四七年五月底，我离开撫松到临江，领导找我谈了情况，确定调我去前綫。工作团人員，撫松当地需要的骨干留下一些，我帶走的較多。六月三日，我离开临江后到前綫，我走后工作团就没有了，但对外保留名义。

当时南满根据地只有临江、长白、蒙江、撫松四个县。撫松、长白又是两大后方。春节前，集中力量搞土改，做好支前、参战、安置伤兵等工作，准备打仗。“五、四”指示以后，撫松搞过一次土改，城区搞过，万良中心地区搞过，也有些地区没搞。所以对搞过的地区进行复查，没搞过的地区立即进行土改。土改工作在全县鋪开了。

春节后，一面进行土改复查，一面整顿健全乡政权，进行党的建設，还要支援战争，安置伤员，任务繁重。春耕时，为了不误农时，把土改，生产和組織建設結合起来进行。首先在土改工作队中发展了党员，一九四七年二月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地方主要物色积极分子，准备发展。三月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以后布置一次組織发展工作，我走时还没有結束。

县委原来沒有办事机关，一九四七年二月才建立起来。张大竹、郭紹义、方述才都是县委委員。設有組織、宣传、民运三个部，我兼任組織部长，方述才任宣传部长，郭紹义任民运部长。

陈宇口述（全国总工会顧問）

东春、斌芬整理

撫松縣第一支人民武裝保安團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八路軍進駐撫松縣城，撫松縣人民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由山東等地老解放區派往撫松縣工作的李南洲等同志，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建立了撫松縣人民政府，為了保護人民政權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於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籌建撫松縣大隊（保安團）。到一九四八年十月，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保安團發展到八百多人，後編入東北野戰部隊。

建立人民武裝

撫松解放後，國民黨中央先遣軍三十三師三團分隊長于福在黃松甸子，挾其部下十三人（短槍一支、長槍十七支、機槍一挺）上山為匪，報號“東北剿共游擊大隊”。國民黨特務張遠起等也潛入撫松陰謀策劃，拉起了“剿共軍”、“岳營”、“黑膽子戰”等匪幫。他們與封建勢力相勾結，不斷偷襲破壞地方政權，殺害我黨政幹部，搶掠民財，擾亂社會治安，成為撫松人民群眾的大禍患。

為了保衛人民政權，保衛長白山革命根據地建設，必須建立一支堅強的人民武裝。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撫松縣人民政府貼出招兵啟事，二十四日派我和戰鬥英雄劉文岐，專職負責縣大隊工作。應招的有七十多人，（實為一個排）。縣書記李政兼任政委，縣長李南洲兼任大隊長，我任副大隊長，劉文岐任中隊長（排長）。一九四六年二月，兵員擴大到一百七十多人。從安圖籌集長槍一百二十

五支，充实了装备，組成了一支正規的人民武裝——撫松縣縣大隊。當時的主要任務是保衛縣、區人民政權，維護社會治安，配合工作隊下鄉開辟工作。

形勢突變

一九四六年，南滿根據地只有臨江、撫松、長白、蒙江四個縣，在這不足二十萬人口的地方，駐有中共遼東分局、遼東軍區、遼寧省委和省府以及野戰醫院、軍用被服廠、兵工廠、報社、造幣廠、廣播電台等四十多個黨政重要機關單位。還駐有東北民主聯軍三縱和四縱兩個野戰軍以及楊靖宇支隊和李紅光支隊。

國民黨反動派把南滿根據地視為心腹大患，糾集了十多万軍隊，向南滿根據地撲來，企圖奪取這四個縣，將南滿根據地吃掉。在國民黨大軍壓境，土匪猖獗的嚴重形勢下，縣大隊的新兵開始分化，原出身於日偽、軍、警、特務、土匪和投機分子，密謀勾結策劃叛變。一九四六年六月，連續發生多起叛變和集體退伍事件。駐東崗區的縣大隊二排三班班長姜永清（原抽水洞區偽警察署特務系主任），四班長王殿元（解放前一直不務正業），挾十二名戰士和兩名伙夫叛變，投於福匪幫。縣大隊衛生員李文喜（偽警長）與偽警尉吳景剛、王景文等，結伙拉起“剿共軍”。駐北崗區的縣大隊三排八班長郝培林（抗聯叛徒）和七班戰士，由金璞（土匪）挾十二名戰士叛變投“剿共軍”，上述叛伙，最後全部投入“東北剿共游擊大隊”。駐抽水洞區的縣大隊朝族班，在班長的帶領下退伍返籍。

六月末，縣大隊一排長劉文岐，帶一個班去蒙江縣執行

任务，归途中在陈家滩子遭到于福匪帮一百五十余人的伏击，战斗英雄刘文岐排长和战斗英雄沙克勤班长以及三名战士壮烈牺牲。

发展壮大

在人员不纯，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县委于七月初决定对县大队进行整顿，为加强党对人民武装的领导，八月份派李天同志专职任县大队政委。又把腐化堕落的副排长辛中亮开除出军籍。整顿后扩充了一批新兵扩编为五个连队。经过训练，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战士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十月份，县大队扩编为撫松县保安团，派通化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金才同志兼任团长，县委书记田稼丰同志兼任第一政委，李天同志任政委，我任副团长兼参谋长。从此，这支部队越战越强，成为野战部队的一支可靠的后备力量。一九四七年初，“四保临江”时，撫松县保安团向野战部队输送了四个连队。一九四八年秋，全部编为野战部队。

一九四七年五月，为便于统一指挥，确保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军区命令成立了撫松县人民武装指挥部，任李红光为支队长，吴靖宇为司令员，田稼丰为政委，我任副司令员。在军事活动上，凡驻撫松境内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和军队生产单位，都由指挥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歼敌记事

迫降于福。通化支队一团解放撫松后，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调往他地执行新的任务。通化支队三团攻打安图县后，驻防撫松，地方治安的维护任务就由县大队承担。

刚刚建立起来的撫松县大队，发现于福匪帮在县城近郊一带活动，便开始追剿。一天，偵察小组的三人，去兴隆村偵察匪情时，誤入匪穴被捕，匪首于福命令拉至板石沟处死。途中，被县大队截击，救回了三名偵察員。于福匪帮当时只有十三人，由于人少胆虛，随即慌忙逃走。县大队紧追不放，在三道庙崴、大浦河、兴茂、小山、漫江等地連打五仗，虽然双方均无伤亡，但于福匪帮中已經有两人弃械下山，其余十一人逃窜到长白县二道崗繼續为非做歹。旧历年底，这帮土匪窜回撫松县西崗村。县大队获悉情报后，和通化支队三团各派一个排前往追剿。大年初一，部队刚到大房子，就被穴居在老母猪圈子的土匪发现，双方接火后，我斃匪一人，其余匪徒逃入山林。部队的追剿，使于福匪帮无落脚之地，于福只好率残匪十人，下山向人民政府投降。

围剿“新中央”。一九四六年二月，为了保护农村政权，县大队分別駐在万良、抽水洞、东崗、北崗等区。通化支队三团調走后，李紅光支队来撫松駐防。其中一个大队駐蒙江县龙泉鎮，防御国民党部队从西面进犯南滿根据地；一个大队駐防二道江沿岸，防御国民党军队从北面进犯南滿根据地。支队机关和一个大队駐撫松县城，負責撫松、长白、蒙江、临江一部分地区的清剿土匪任务，协助各县大队、区中队維護社会治安。

一九四六年三月，大帮土匪“新中央”三百余人，由安图窜至撫松县三道砬子河。县大队和李紅光支队的—个中队联合围剿，在三道砬子河打了三天三夜，击斃匪徒十七人，击伤十余人，其余逃之夭夭。

张平孤身入匪穴。一九四六年三月，赵滿順匪帮經常在

万良区一带打家劫舍。万良区区长孙锡亮同志，通过回答赵福顺的“海叶”，多次亲笔写信给赵福顺，劝其认清形势，放下武器，重新做人。县大队排长张平独身深入匪穴（东兴村），向赵福顺及其十余名匪徒，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土匪受到教育后，相信了共产党，交出武器，归顺为民。

歼灭“黑瞎子战”。一九四六年七月，“黑瞎子战”匪帮十余人，在匪首胡新民的带领下，准备在蒙江县上仁义砬子截击撫松县县长李南洲及民运工作队。匪帮水籍、王德华等两名匪徒在执行打探任务中，于东大村向人民政府投诚。县大队根据王德华提供的线索，追剿“黑瞎子战”。由于连续追剿，匪心浮动，先后向人民政府投降，匪首胡新民投降后，潜逃至黑龙江省黑山县，后被我人民政府处决。

向英烈致敬

撫松县大队，从成立到扩编为撫松县保安团，最后编入野战部队，共经历两年半的时间。这支部队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在清剿土匪、除奸反特、支援前线、保卫政权等工作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五十多名同志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和热爱党、热爱新政权、热爱人民的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唐林根（吉林省军区干休所）口述

宋永春整理

我在撫松縣萬良區工作的回憶

“九、三”光復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從關內老解放區抽調一批地方幹部和部隊幹部到東北，配合蘇聯紅軍和東北民主聯軍接收東北地區。

1945年11月，中共膠東區委抽調一大批同志，集訓後派到東北。我們這批人共有百餘名，為避開國民黨封鎖，從山東省黃縣的龍口，乘民用小船橫渡渤海，計劃到東北皮口下船，但途中船隊遇大風被海浪沖散，我們只好在普蘭店登陸。住了兩天，又徒步到宮園中共東北局報到，休整了一個星期。人員到齊後，我們被分配到通化地區。中共通化地區委又把我和姚福通、唐林根、張平等八名同志分配到撫松縣，途中在臨江縣過元旦，1946年1月上旬到達撫松縣城。

撫松解放後，由李政任政委主持中共撫松縣委工作。李南洲同志任撫松縣縣長。我們到撫松後，姚福通同志接任撫松縣各界人民建國聯合會主任，我被分配到萬良區任區長。

萬良區政權建立的比較早，是個比較大的區。我到萬良區之後，縣大隊派張平排長帶一個武裝班，到萬良區駐防，並協助區進行建政工作。

區公所工作人員的來源是：先吸收了原萬良村偽村公所僱員夏秀峰，以後又從萬良小學教員中選用了馬城禮、劉兆林，後來上級陸續派孫桂芳、孫繼森、佟永華等同志，相繼組成了區公所、區建國聯合會、區中隊等組織。縣里又派民

运工作队王庆祥、田永芳等协助工作，使人员增加到20多名，以后成立了中共万良区委员会，区委书记江樁。江樁同志调走后，我任区委书记。1943年春，我被调到东岗区任区委书记，黎明同志任万良区委副书记。1949年3月我就随军南下了。

1946年南满根据地只有临江、抚松、蒙江、长白四个县。抚松县即是南满根据地的后方，又是南满根据地与北满根据地的唯一交通枢纽。当时的工作重心是保卫和建设南满根据地。我区的主要任务是战勤工作。抚松解放后，通化支队（后改为，杨靖宇支队）三团攻打安图县时，在北岗区设立了兵站，后来又换一团攻打安图县，这次战勤任务，主要由万良区承担。派人、派车、组织牛爬犁运送枪支、弹药、伤员、给养等任务很重。把人和车（或爬犁）派出去，只有牛、马累坏了或死了，才能回来。在这次战勤工作中，仅万良一个区累坏或累死的牛、马就有二百多头。

由于国民党纠集十余万军队向南满根据地进攻，一所野战医院迁到了万良。这所医院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共50多人，其中多半是日本人，院部设在伪警察署。伤员有130余人，都分散在群众家里。

抚松解放初期，土匪比较多。有本县大股土匪于福匪帮，还有桦甸、安图、蒙江等邻县流窜过来的匪帮，大帮有二、三百人，小帮十几人，也有“单帮”。他们经常活动在万良区内的各村屯，到处打家劫舍，为非作歹。特别是于福匪帮经常以偷盗、堵截等手段破坏革命政权，扰乱社会治安，阻碍生产建设，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

1946年5月，安图县解放后，为了保证这条南、北

滿根据地的唯一交通要道的安全，楊靖宇支队三团在北崗村設立了一处兵站，有一个营在此駐防。有一天，从北崗来了两名騎兵通訊員，在大方村吃的午飯，到万良区公所做暫短休息后，便向撫松县城进发。当走到仁义屯南边一里远的仁义砬子时，被土匪截击，当即一人中弹牺牲，土匪劫去捷克式馬枪一支，子弹78发。不久，万良反奸清算斗争結束了，姚福通同志帶民运工作队回县。因有的工作队员患病，区里派了一輛牛車。为了預防跟土匪遭遇，区里还派了一个武装班护送，並用电话通知县大队派武装接迎。当路过仁义砬子时，又遭到土匪的堵击。走在前面的班长章汉、战士张文元，被冷枪击伤。姚福通同志发现土匪占居砬子上边，便指揮干部、战士隱蔽在砬子下边，組織火力封鎖砬子兩側，使土匪不得靠近。土匪从砬子上面打不着工作队，側面又下不来，坚持了一段時間，我們在区里听到枪响很着急，張平排长帶另一个班去增援，县大队派的接应部队（一个排）正在葦芦村吃午飯，听枪响后即从村里冲出来。土匪見南北都有部队，便向大方頂子逃遁。

这两次事件发生之后，县委对万良区保卫工作就更加重視了。楊靖宇支队三团王团长帶一个連駐防万良，七、八月份三团調走后，李紅光支队又派一个支队駐防。另外，通过反奸清算斗争和減租減息运动，群众觉悟提高了，发现土匪、特务都能及时报告。土匪公开活动也有减少，但常以“海叶”的形式写信，扰乱群众生活。我借黄泥、大方、明水、葦芦等村回答土匪“海叶”的机会，多次亲笔写信，向土匪講明我党的寬大政策，劝其認清形势，放下武器，重新做人。